

论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特点

李腊生

经济周期作为一种客观经济规律不仅被世界各国的实践所证明,而且其理论的普遍性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中国经济在顺利地经历了1996年的“软着陆”以后,新一轮经济周期即将启动。本文在简要回顾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下,结合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与当前的实际经济状况,对新一轮经济周期之主要特点作一些探讨或展望。

一、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简要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虽然在改革前后的两个阶段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国民经济运行表现出周期性的特点并没有改变。1954-1996年,国民经济运行共经历了10次周期运动,其中改革开放后的18年包含了4次经济周期。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基本情况

周期次序	时间	期长度 (年)	国民生产总值 (GNP)增长率 (%)	农业经济增 长率 (%)	国有单位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率 (%)
第1次	1955-1957	3	8.26	5.15	13.78
第2次	1958-1961	4	-2.20	-8.36	0.79
第3次	1962-1967	6	7.35	7.97	3.13
第4次	1968-1972	5	8.64	0.92	17.07
第5次	1973-1974	2	4.66	6.45	5.93
第6次	1975-1976	2	2.68	-0.03	6.36
第7次	1977-1981	5	7.65	2.54	4.96
第8次	1982-1986	5	10.56	7.70	24.27
第9次	1987-1990	4	7.76	4.40	10.21
第10次	1991-1996	6	11.57	4.15	29.7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1997。

说明:1978年以前为国民收入增长率。

从表1明显可以看出前6个周期与后4个周期的区别:前6个周期不仅在周期所持续的时间上表现得极为不稳定,没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数量,而且经济增长率在不同的周期期间差异也很大,最低值为第2个周期的-2.20%,而最高值则为第4个周期的8.64%,两者相差10.8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的4个周期,周期长度基本为5年,并且经济增长率也表现得相对较为稳定,最高的第10个周期为11.57%,仅高于最低的第7个周期7.65%的3.92个百分点。与改革开放前6个周期相比,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率平均水平明显提高。

经济周期运动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扩张与收缩的交替运动,在这种交替运动的背后却包含着其深刻的经济特征。我国的经济周期运动,由于改革开放前后处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就使其运动过程不仅在某些方面体现了经济周期的共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明显的个性特征。

中、美、日、韩四国1960-1989年的经济周期运动情况见表2。

表2 中、美、日、韩经济波动情况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1960-1989年GNP平均增长率 (%)	5.9	3.1	7.1	10.3
经济周期的次数 (谷底至谷底)	7	6	5	4
平均持续的时间 (年)	4.0	4.8	4.8	6.3
最大扩张幅度 (%)	25.8	6.2	4.2	10.7
最大收缩幅度 (%)	-28.3	-5.6	-9.3	-10.4
总离散系数 (%)	169.15	71.16	59.75	46.31

注:从1961-1989年;1960-1989年;1962-1986年;1960-1985年;为国民收入;相邻两年经济增长率之落差;指观测值与平均值的偏离程度,计算公式为 $\eta = \sigma/\bar{y} \times 100\%$,其中: η 为离散系数, σ 为标准差, \bar{y} 为GNP平均增长率。

对照四国经济运行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经济周期运动的个性特征:(1)我国的经济周期是最为频繁的。1960-1989年,中、美、日、韩四国经济周期出现的次数分别为7、6、5、4次,平均每个周期所持续的时间也以我国的4年为最小,如果加上1954-1961年之间的两个周期,则我国每个经济周期平均持续的

时间还不到4年,而美国1933-1982年间的10个周期平均每个周期持续的时间为60个月(5年);(2)除经济周期频繁出现以外,我国每个周期内的波动也是极其剧烈的。1957-1961年这个周期,离散系数竟达到865.62%,1961-1967年也高达144.33%,1967-1972年达到125.19%。由于周期内剧烈的波动,使得1960-1989年整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在总体上极为不稳定,其离散系数高达169.15%,是美国的2倍多,日本的3倍,韩国的4倍;(3)我国的经济周期运动在相邻周期的交替中也是最不稳定的,最大扩张幅度达到25.8%,是美国的4倍多,日本的6倍多,韩国的2倍多,最大收缩幅度达-28.3%,是美国的5倍多,日本的3倍多,韩国的近3倍,这同时也说明我国的周期转换是相当突然的。除表2所显示的特征外,我国经济周期运行还表现出另一些特征,即:(4)在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期间,就业状况没有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当经济运行由繁荣走向衰退时,失业率没有显著的提高,基本保持了繁荣期的水平。这一点与经济周期描述的不同阶段就业水平的明显改变之特点是明显不一致的;(5)在经济衰退期间,大量企业倒闭、破产的现象在我国没有发生,即使是近些年来,开始有倒闭与破产的企业,但其数量也是极少的;(6)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交替运动中,我们人为地弱化了优胜劣汰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使得经济效率总体上出现了一种下降的趋势。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周期运动的稳定性有了根本性的好转,1977-1981年这个周期,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7.7%,离散系数却只有23.87%,这充分说明“六五”时期国民经济真正实现了高速健康增长,整个1979-1993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达到9.2%,离散系数38.64%。尤其是1979-1985年的经济运动形态,基本达到日本60年代经济起飞时的水平(60年代,日本的GNP平均增长率为11.2%,离散系数为24.18%),在一定程度上超过韩国70、80年代的运动水平(韩国70、80年代GNP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7%和9.8%,离散系数分别为27.63%和28.11%)。1996年顺利实现“软着陆”,标志着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趋于成熟,一个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

二、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基本运行轨迹

经济周期作为一种客观经济规律,虽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周期的运动形态。严格地说,外力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并不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本原因,可是它却无疑能加剧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有时甚至能改变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转折的时期与某些阶段持续的时间。

40多年的实践表明决定我国经济周期基本运动形态的主要因素有两点:一是农业生产状况;二是投资政策。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基础作用除了体现在社会经济的稳定上之外,同时,它还构成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转换的基础。从农业经济增长率与国民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上看,不难发现农业经济增长率与GN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1952-1996年,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率与GN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0.278。如果说0.278的相关系数还不能充分说明农业经济对GNP增长率的决定作用的话,那么只要我们将农业经济增长率滞后一年再计算其相关系数,就会发现相关系数一下子提高到+0.512的水平,0.512的相关系数表明两者之间肯定是存在正相关关系。若再用表1中每个周期的平均增长率计算,其相关系数就进一步提高到+0.762。以上三个相关系数值的差别,说明农业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主要不在当年,而是有一个时间滞后,我国经济周期出现频繁转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期对农业经济的忽视,实际上,只要将几个时期对待农业经济发展不同态度及其国民经济的运行结果作一下对比,农业经济对经济周期转换的决定作用就能看得很清楚。1957-1959年,1984-1988年,我们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严重忽视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结果不仅导致了经济周期阶段的转换,而且也使包含该时期的经济周期所持续的时间缩短;相反,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我们充分重视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真正把农业摆在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结果不仅使国民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且使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延长了1~2年。

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并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表现为一种最直接的经济关系。在我国几十年的经济运行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也表现得极为明显,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相关关系。如果以各年投资增长率与GNP增长率为样本计算,得到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427,表明两者之间的确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若进行更一般性的考察,分别以各经济周期的对应值为样本进行计算,相关系数则提高到0.77,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然而,为了说明投资增长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计算它们之间的斯伯曼(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就是必要的,由表1之样本计算得出投资增长率与GNP增长率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891,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以上三个相关系数的值说明:(1)投资增长与GNP增长之间无疑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2)在一般情况下,投资增长率的较小变动对经济增长可能并不产生明显的影响;(3)当投资增长率的变动幅度较大时,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就表现得较为明显;(4)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投资增长率的变动会对经济周期的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当投资增长率在短期内变动剧烈时,它将导致经济周期不同阶段或周期本身的转换,关于最后这一点只要看看每次经济周期转换时的投资增长率变动情况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在第1个周期,投资增长率从1956年的52.83%一下子下降到1957年的-5.97%,然后又于1958年突然上升到84.53%;第2个周期投资增长率从1960年的13.19%降至-62.54%,……;第9个周期投资增长率从1988年的20.23%急速降至1989年的-8.23%,1990年则快速回到15.11%,1991年更是上升到24.31%。虽然投资增长率较大的波动会导致经济周期阶段的转换,但是,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却存在一些差别。改革开放前,投资增长

率的较大波动对经济周期运行的影响是及时的,投资增长率每次的大波动都立即导致了经济周期阶段的转换;然而,改革开放后的第9个周期却显得不那么敏感,投资增长率从1989年的8.23%迅速上升到1990年的15.11%时,经济运行则没有立即从衰退期转向扩张期,而是继续延续着衰退特征,直至1991年方才得以转换。这种状况表明改革开放前后不同时期,经济运行对经济政策的反应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经济运行主要决定于经济政策,投资的波动大体决定了经济的波动;改革开放后,经济运行则基本遵从自身的规律,经济运行受投资波动的影响逐渐弱化。当然,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决定了,即使是在将来,大起大落的投资格局也会扰乱经济周期的运行。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如果投资增长率保持相对稳定的话,经济周期就按照它自身的规律运动,这种运动的周期长度大致在5年左右,并且扩张期大致持续3年左右的时间,收缩期则基本为2年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至今的最后一个周期,即表1中的第10个周期,周期长度为6年,扩张与收缩期各为3年。如果仅就这一周期的时间概念而言,它并没有特殊的地方。然而,当我们结合此间的经济运行状况,设想如果1993年经济运行不表现出极度过热的话(导致1993年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的大幅增加,投资增长率在第一季度超过70%),或者说,若1992年后几年投资增长率的速度相对放缓一些的话,1993年的经济运行是否会出现过热呢?假如1993年不出现过热现象,我们相信,第10个周期的周期长度将肯定延长,扩张期至少会保持4-5年的时间,周期长度则会延长至8年左右。

回顾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近两年来对农业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农业与农民利益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法规,农业生产出现快速稳定增长的好势头。1992、1993年,农业增长率达到4.7%的水平,1994年也达到4.0%的水平,1995年则更是达到5.0%的高水平。近四年来,农业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4.66%,并且其波动幅度保持在1个百分点之内,这种状况是40多年来少有的。在农业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92年的784.0元上升到1995年的1577.7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25%。此外,政府不仅积极鼓励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而且为此政府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种状况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无疑,农业的稳定及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率水平为新一轮经济周期保持在高速增长健康的状态下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农业科技成果快速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因此,根据近几年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及政府对待农业的政策取向,并结合农业在经济周期的作用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在投资不出现大起大落的前提下将被延长,它可能从现在的3年左右延长至5年左右,整个经济周期所持续的时间将由现在的4-5年延长至6-8年。中国的投资在经历了1992、1993年的过热,并在以后的几年内顺利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后,投资政策将发生重大的变革。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政府会将“软着陆”的成功经验推而广之,并高度重视投资增长中大起大落的教训。这就决定了在新一轮经济周期内,政府在投资政策上会保持一种相对稳健的态度,并极有可能将“软着陆”的经验推广至“软启动”。事实上,从当前政府坚持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上看,“软启动”的迹象已非常明显。结合前述投资对经济周期运行的影响作用分析,只要未来一个时期投资能保持一种相对稳健的增长格局,它就不会破坏经济周期运行的轨迹,经济周期将按它自身的规律运行。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预计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的基本轨迹大至可以总结如下:即经济周期所持续的时间大至为6~8年,其中扩张期为5年左右,收缩期为3年左右。

三、经济增长的高速稳态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高速增长趋势会被改变,相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却强化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无疑给亚太地区各国带来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快速发展机遇。中国作为该地区最大的国家,其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的基本格局。反过来说就是,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只有当中国经济成为该地区至少是较为活跃的经济区域时,这种世界经济格局的转移才有可能完成。我国自70年代末期打开国门以来,对外开放程度愈来愈高,并且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中国经济将会变得越来越开放。这就是说,在世纪交替之际,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为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一个绝好的机遇,并且可以相信,中国在吸取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白白丧失发展机遇教训的同时,一定会很好地抓住本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

经过4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实力明显增强,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277.3亿元,处于世界前列。在整体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也显著提高,1952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2元,1978年达到315元,增长了2倍多,平均增长率达到4.4%。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成就更是举世瞩目,人均GNP从1978年的379元上升到1995年的4754元,增长了11倍多,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增长了2.88倍,年均增长率则更是高达8.31%。这种经济成就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可用于经济建设的社会资源的潜力显著增强,投资占GNP的比重明显上升,由“一五”时期的25%左右上升到“六五”期间的30%左右,进而又迅速上升到“八五”时期的近40%。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为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

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是在成功地经历了“软着陆”的前提下启动的,这就标志着经济周期启动的基点被抬高。由于上一轮经济周期 GNP 的最低增长率都保持在 9% 左右,对照分析可以肯定的是,在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期,经济增长率必然会保持在 9% 以上。另外,如果新一轮经济周期“软启动”成立的话,则意味着其投资增长率即使在最繁荣的时候,也不会超过上一轮经济周期的最高值,即 53.2%。可以预见,在“软启动”与“软着陆”的政策取向,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投资增长率将保持在 20~ 40% 之间,与此对应的经济增长率将落在 8~ 15% 之内,平均增长率水平将略高于第 10 次经济周期的水平,达到 12% 左右。

综上所述,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高水平则是无疑的,并且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运行还将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周期内增长率的最高波动幅度也将不会超过最低增长率的 50%。

四、结构性调整将更加突出

随着“两个转变”的逐步实施,加上在一个较长时期可能采取的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繁荣已不太可能单纯依靠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来推动,结构性调整将成为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突出特点。

在一个生产要素具有充分流动性的经济中,结构性调整的原动力来源于不同部门的相对收入差别,竞争的结果会使各部门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虽然当前我国并不具备要素充分流动的市场环境,但是,也必须看到,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已有了长足的进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作为“九五”时期的中心任务已经确定。纵观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与一系列改革举措,可以预见,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经济协调手段将以经济手段为主,也就是说,经济利益及其经济关系的调整将变成以市场为主导。在一个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中,经济利益作为经济主体追求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它的相对差别构成了结构性调整的主要诱因,当某一部门的相对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它部门时,一方面将促进该部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另一方面将诱导新的经济主体的进入。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将引起该部门产品的供需状况发生变化,竞争的结果使高于平均利润的部门逐渐消失。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市场作用将使相对收入较高的部门表现出更快的发展速度,相对收入较低的部门则相反,部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保持快于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水平,并且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将成为发展最快且最具活力的部门。在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渐趋于合理的同时,农、林、牧、渔业将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协调健康发展最值得重视的部门。

五、经济周期阶段转换的动因

所有的经济周期均共同地表现为上升与下降的交替运动,然而,导致各个经济周期阶段转换的直接动因则是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的直接动因在于政府直接投资的过度扩张所引起的经济失衡;而经济从衰退走向扩张的直接动因在于政府不能忍受较低的经济增长率。改革开放后,政府直接决定经济走势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周期阶段转换的动因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虽然经济从衰退走向繁荣的动因仍主要是政府不能忍受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但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的主要原因则在于较高的通货膨胀,政府面对社会公众对高通货膨胀的强烈反对,不得不采取必要的紧缩政策,结果,在通货膨胀得到抑制的同时,经济也就从繁荣走向衰退了。

新一轮经济周期在经历了 3-5 年的上升阶段后,也会从繁荣走向衰退,然而,由于新一轮经济周期所处的客观社会经济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引起经济周期阶段转换的主要原因与以往不同。我们认为,引起新一轮经济周期阶段转变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其中房地产业有效需求不足将成为经济周期阶段转换的导火线。

1.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短缺经济后,现已基本从短缺经济中走出来,一个以买方市场为特征的经济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在一个买方市场的经济环境中,经济能否持续繁荣,其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有效需求是否能持续递增。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收入水平的大幅上升,我国居民基本生活条件获得满足后,收入的需求弹性将趋于下降。这就是说,当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收入增量用于消费的部分将趋于降低,即使是当收入水平的增长与实际经济的增长保持同步,也会因有效需求的增加赶不上生产水平的增加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一旦有效需求出现不足,经济繁荣的局面也就不再可能维持,结果必然引起经济衰退。实际上,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在 1991-1996 年的经济周期中已经初见端倪,只是由于该周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结构性的供需矛盾,结果掩盖了作为次要矛盾的有效需求不足的事实。

2. 从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看,新一轮经济周期试图以房地产业的启动为突破口,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复苏。显然,将房地产业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此为突破口带动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启动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当前居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支付能力极为有限,即使是对房地产业存在潜在的需求,这种需求也并不构成有效需求,对绝大多数居民来说,他们尚无购买房产的能力,即使是采取多样性的售房方式,也会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使其房地产业的长期繁荣成为不可能。更何况多样化的售房方式中明显存在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1)对新一轮经济周期乃至更长时期通货膨胀的预期;(2)商业银行作为一个企业,在为房地产商和居民购房提供融资的过程中,必须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贷款利率不可能定得太低;(3)信贷规模的总量控制将严重制约着有效需求的持续放大;(4)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这些问题若不能获得妥善解决,房地产业的持续繁荣将是不可能的。另外,房地产业被中央政府明确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无疑会刺激地方政府对其的投资冲动,(下转第 67 页)

的投放,即银行信贷资金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生产者方面,而不体现在消费者身上。对于消费者而言,尽管收入呈现刚性增长,但大多数消费者要进入较高水平的发展型、享受型消费领域,却还是缺乏足够的资金,如住房、汽车等产品的购买,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是可望而不可求的,若要实现预期需求,则只有依靠消费信贷来实现。因此,应将过去的不合理信贷结构向合理化调整,使生产贷款结构优化,消费者获得足够的贷款;换言之,一方面信贷资金应大力投向基础设施与新兴产业,投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投向产品有销路、效益好的企业,另一方面则应提供消费信贷并加大其在整个信贷中所占的比重。

第四,调整消费结构。消费强劲,生产就发展,消费疲软尤其是即期消费收缩,生产就萎靡,长期供给也迟早会收缩,这是需求对供给的正负效应的具体体现。我们知道,消费需求要保持正常发展,就必须有合理的消费结构,而目前我国的消费结构如同生产结构一样,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其表现就是:一是消费区域不合理,即人口占29.4%的城镇消费大于人口占70.6%的农村消费,如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前者消费约占57%,后者则为43%。二是消费品内部不合理,即用于食品支出的比重过大,如1997年城乡食品支出分别占到46.4%和55.2%,而用于住房、交通通讯、教育、服务等支出比重过小。因此,调整两者的合理比例很有必要,即,一方面在提高农村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加大农村市场的开发;另一方面加强住房、教育、交通通讯、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比例,引导消费者的结余购买力向这些方面转化。

总之,从目前市场的供求环境来看,在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总量调控政策的前提下,加大“调整启动”的力度,积极培育和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保持对经济增长适当拉力,防止社会总需求的进一步回落,是保证国民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必要措施。

注释:

郑京平等:《‘软着陆’前后……》,载《中国统计》,1997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人民日报》,1998-04-02。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杨宗传)

(上接第63页)然而地方政府的这种投资冲动并非源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而是出于政绩的需要,这种状况将使房地产业的发展脱离实际需求,导致供给过剩,因此,我们认为,房地产业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繁荣之后,它的发展将会明显地受制于有效需求不足,结果使其成为引发经济衰退的导火索。

3. “九五”期间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决定了社会需求的扩张只可能是缓慢的和有节制的,当这种从紧的经济政策经历一个时期后,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会充分暴露,一旦有效需求出现不足,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也就象“缺水的鱼”,是绝对不可能继续维持的,经济衰退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也正因为这种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决定了新一轮经济周期即使出现通货膨胀,其方式也将是温和的。

4. 众所周知,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难中之难。实践表明,国有企业要实现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国有企业与市场体制的不协调或国有企业对市场机制的不适应仍将会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来。国有企业对市场机制的不适应对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产品的供需错位,导致大量的无效供给,致使大量的社会资源滞留在无效益的企业中,结果必然加剧社会资金的短缺,极大地削弱有效需求的扩张能力;二是由于国有企业效率普遍偏低,并且这种状况短期内不可能获得根本的转变,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的增长不可能赶上整体的经济发展,严重制约着相当一部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需求作为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它的相对不足除直接降低总需求外,还会通过经济变量的内在联系间接地影响总需求的扩张能力。当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经过时间的推移逐渐聚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从量变发展到质变,引起经济周期阶段的转换。

(作者单位: 天津财经学院统计系)

(责任编辑: 曾德国)